

焦点关注

高龄老人离婚数量逐年攀升——

自我意识提升，女性更不愿意“忍”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法官张鹏在过去半年审理离婚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三起高龄老人离婚案件，年龄最大的一起当事人为94岁。张鹏有些纳闷，“这么大年龄，应该好好过啊，怎么还离婚呢？”

搜索相关案例后，张鹏发现，75岁以上老人离婚案件呈现增长态势。

高龄老人离婚案件呈现增长态势

“近五年来，北京二中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有一方为7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案件共有46件，且数量逐年攀升。这类案件中夫妻间年龄相差10岁以上的有20件，占43.48%，其中不乏近年来饱受争议的‘保姆型’婚姻。”张鹏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关于高龄老人离婚案件呈增长态势，张鹏认为，主要和老龄社会的到来有关。一些老年人自我意识提升，忍了对方一辈子，孩子大了，不愿意再忍受，要过自己的生活。这类案件约占20%左右，提出离婚的以女性居多。

董某（女，1937年出生）与赵某（男，1935年出生）于1957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子女三人。董某起诉离婚，称赵某对其进

行殴打，肆意制造异味、异物，常因生活琐事吵架，双方夫妻感情破裂。

另一起案件中，郭某（女，1945年出生）与王某（男，1947年出生）于1967年举行结婚仪式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育有6名子女。郭某因家庭琐事为由起诉要求离婚。

“这两个案子法院认为双方感情没有破裂，没有判决离婚，二审维持原判。主要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矛盾皆为生活琐事。”张鹏告诉记者。

高龄老人离婚案件增多的另外一个原因，“半路夫妻”占比较高，前期缺乏沟通。双方子女对各自老人意志影响较多，一旦出现矛盾，子女代表老人做决定，不愿老人受委屈，离婚的情况较多见。在高龄老人离婚案件中的重组家庭，有近七成成为双方再婚且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半路夫妻”婚前未将财产理清楚，也是造成纠纷的原因。财产较多一方的子女不愿意对方分财产，老人再婚后会更容易离婚。

在一起“保姆型”离婚案件中，赵某（女，1958年出生）与王某（男，1944年出生）自由恋爱，于2013年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未共同生育子女。双方婚后共同居住宅院拆迁，赵某要求分得拆迁安置房，王某称赵某不享有拆迁宅院的利益。加之双方因日常生活琐事经常产生矛盾，王某遂要求离婚。

法院因赵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拆迁安置房有其份额，且安置房尚未交付，故判决双方离婚，未支持赵某要求分得拆迁安置房的请求。

张鹏告诉记者，高龄老人离婚案件中，“保姆型”婚姻约占两成左右。这类婚姻，通常开始于女方照顾老人，双方后来结婚。老人子女通常认为，女方没有做什么贡献，将来还要继承老人遗产，分走财产，就会让老人提出离婚。有的是女方提出离婚，主要是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自己付出越来越多，加之双方感情并不深厚，对生活感到厌倦。

应协商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确保老有所养

据介绍，在涉老离婚案件中，约有三成的当事人因疾病缠身、路途遥远等原因无法到庭。为了方便确有诉讼意愿的老年人，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信息化手段，利用云庭审、微信视频、云会议等方式，让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可以参加诉讼活动。如果高龄老人无法利用线上方式，法官会亲自前往老年人的居所或者医院，当面询问其离婚的意愿。对于失去表达能力的当事人，也会通过法定程序，在其子女中选出法定代理人，代理其完成诉讼程序。

播报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高空抛物？这是犯罪！上海已有人被判刑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后上海首次以高空抛物罪提起公诉的案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於某某因犯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据悉，2021年2月10日9时许，被告人於某某在三楼住处，将一只装有陶瓷杯碎片等垃圾的塑料袋从厨房窗口扔出，砸伤途经底楼人行通道的被害人蒋女士头面部。经鉴定，被害人面部瘢痕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3月2日，於某某被民警抓获，到案后陆续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审理期间，於某某的亲属向法院预交钱款用于赔偿。

被从天而降的垃圾砸伤，至今还惊魂未定的蒋女士说，当日9时许，她在小区出口的人行通道处，突然高空有一只装着东西的塑料袋砸到她头上，致其右侧眼角鲜血直流。她看见被丢下的塑料袋里面有陶瓷杯碎片等垃圾，便将这包垃圾保留下来，在他人帮助下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

案发后，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工作，同时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2021年3月2日，被告人於某某在其居住地被民警抓获。

公诉人当庭出示五组证据还原案发当日具体过程；阐明法律适用依据并充分考虑本案情节、被害人伤情、赔偿谅解情况、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在案件处理全过程的表现，建议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於某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於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预交钱款用于赔偿，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据联合国网站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在其《信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闭状态，这场卫生危机给教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世界各地暂时关闭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寻找替代教学方法。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带来持久的影响。

失去学校环境的负面影响

文章表示，令人最担心的是，失去了学校环境所能提供的社交互动和日常活动，会给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就连终日沉浸于新技术的Z世代（1996年至2015年间出生的人）和阿尔法世代（2015年后出生的人）也渴望抛开手中的电子设备，开展社交互动和获得亲身体验。这或许正是教育工作者在线上平台授课的最大挑战。

由于严格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社交互动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以前的状态。由此给当代学生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后数年内显现出来。

此外，世界各地有许多儿童本来可以在学校吃到一顿免费的正餐。在学校关闭之后，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但往往没能成功。教科文组织表示，受到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学校停课影响，全球有超过一亿儿童未能达到相应年龄段的最低阅读水平。

机器人代领毕业证

文章指出，形势不容乐观，但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都在积极寻找创新方式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在日本，机器人代替学生本人出席大学毕业典礼；中国学生利用帽子来保持社交距离。教育工作者还必须在内容设计方面发挥创造力，利用现有的数字平台，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授学科知识。

为了弥补社交互动的缺失，一些学校的辅导员开展主题活动来吸引学生参与，一些教育工作者甚至在课堂上办起了虚拟野餐。农村学校的教师要想与学生交流，就得另想办法，他们通常会给学生家长的移动设备发送信息或是打电话。有的学生家里甚至连铅笔都没有，更不用说计算机了。遇到这种情况，教师们就必须随机应变，摸索出新的教学方法。

在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等国，有关各方通力协作，确保贫困儿童能够用上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移动热点。印度的古鲁萨拉（Gurushala）是一个学习门户网站，专门为教师开办数字教育，并为学生提供相关内容。

减少教育中的不平等

文章表示，使用数字技术意味着需要普及这种技术。新冠疫情突显出了世界各地在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重塑学校的教育机会至关重要



科特迪瓦的学校重开后，儿童戴着口罩返校上课。联合国儿基会图片/弗兰克·迪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受到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学校停课影响，全球有超过一亿儿童未能达到相应年龄段的最低阅读水平。联合国儿基会图片

让人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数字鸿沟，而且就连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鸿沟。在疫情暴发之前，网民只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0%，各国政府、出版商、技术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必须通力合作，让教育工作者能够为世界各地尽可能多的学生提供在线异步教育和同步教育。

这方面的项目之一是“学习护照”。这是一个远程数字学习平台，最初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微软公司为流离失所儿童和难民儿童合作开发的。项目原定于2020年启动试点计划，科索沃、东帝汶和乌克兰儿童将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但项目迅速扩大了覆盖范围，将世界各地受停摆影响的学校都包括在内。现在，凡是开设在线教学课程的国家都可以访问项目内容，获得在图书馆、视频资料，以及为学习存在障碍的儿童的家

长提供更多支持。要在今后10年内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四，教科文组织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携起手

来，为所有人打造出更加具有抗御力、更加包容和更加公平的教育系统。

反思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文章指出，新的远程学习环境要求教育工作者在审视教学内容和最佳在线教学方法时必须发挥创造力。这促使教育工作者的作用进行反思，同时也让教学内容备受关注。

这方面的经验还表明，办学方法存在很大的灵活性，这就为相对传统的教育形式和教育结构提供了更多替代方案。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都注意到，一部分学生或儿童在新的环境下如鱼得水。这可能促使远程学习的发展日臻完善，或是为喜欢这种教育体验的学生提供多种混

合学习选择。教科文组织表示，要重新定义新冠疫情过后的未来教育，需要众多利益攸关方通力协作。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坦诚面对问题，然后采取必要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新华社记者 孙飞 赵瑞希

如今，消费者在饭店用餐时，扫码点餐已十分普遍。但部分餐厅点餐、买单时，要求强制关注微信公众号，有的还需要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等。本来只想安静地吃个饭，没想到却被“收割”一波个人信息，不少顾客顿觉饭菜“不香”，商家“流量捆绑”何时休？

扫码点餐藏“公号陷阱”，引强制关注质疑

“进店扫码点餐。”如今，消费者在餐厅吃饭时，通过手机扫码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式。快速普及的扫码点餐，为商户节省了人力，给顾客带来了便利，但也暗藏“强制关注”的陷阱，引发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讨论。

在深圳福田工作的张小姐说，在不少餐厅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公众号，多花了时间不说，手机App也变得十分“臃肿”，有时还会收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现在“吃完饭就取关”。

记者走访深圳数个商圈了解到，多数餐厅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扫码后，约有一半餐厅要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进行点餐，一些餐厅扫码后还要要求用手机号登录才能点餐。还有餐厅的点餐系统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

在茶饮品牌“喜茶”的一家门店，记者用微信扫码下单，被要求用微信手机号一键绑定或者其他手机号绑定，否则无法下单。若用支付宝扫码，顾客需要授权商家使用手机号、昵称、头像、性别、地区等信息。

深圳市消委会法律部负责人何宝媚说，近期当地组织志愿者走访调查了36个大中型商超、26个连锁餐饮品牌共计260个门店，有97.02%的商家采用了扫码消费，其中95.64%的商家在扫码后仍需关注或授权才可进行消费。

同时，深圳市消委会以线上投票的方式调研了消费者对扫码消费问题的看法，共963名消费者参与了投票，949名消费者遇到需同意授权或注册会员才能使用的情形，941名消费者表示介意商家收集个人信息。

“为什么点个餐必须提交个人信息？商家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收集个人信息吗？这些个人信息被收集后会被如何使用？有没有信息泄露风险？”张小姐问出了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关注后被“画像”，或损害消费者权益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开发的门槛不高，市面上存在不少开发扫码点餐小程序的技术企业。

一位技术企业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可快速搭建包括App、小程序、公众号在内的扫码点餐系统，客户可选择让消费者扫码跳转关注微信公众号中的服务号，再进入点餐页面。而在餐品结算时，“在后台可以自定义添加要求顾客填的信息，就餐人数、顾客姓名、联系方式等都可”。

消费者还可能“一不留神”就被商家“画了像”。

国内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数据，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商户可以有针对性地打折扣、优惠券、积分等营销措施推送给顾客。

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画像”，本想安静地吃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凝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这类问题并非仅出现在餐厅用餐中，停车场扫码缴费、酒店扫码入住……多个生活场景都出现了需要授权才能消费的默认性或强制性提交个人信息的情况，大有蔓延之势。更有不少商家通过打折和赠送小礼品获取个人信息，比如商场里扫码领取化妆品小样的自动售卖机等。

不论店大、店小，各类商家都在积极地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但其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充足？2018年，旗下包括海底捞、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华住集团就曾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5亿条会员信息在境外网站上挂售。

扫码点餐需有安全“边界”，“信息收割”亟待规范

不少业界专家认为，餐饮作为最基本的消费之一，覆盖了几

乎所有的消费者，近来由扫码点餐消费等带来的“信息收割”迹象，亟待采取措施予以规范。与此同时，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各行业的扫码消费管理细则，建立扫码消费的数据安全“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扫码点餐涉及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餐厅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不应强制关注公众号、强迫提供信息，部分技术公司宣称顾客信息储存在“云端”，但仍可能引发隐私泄露忧虑。

实际上，围绕个人信息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等顶层设计均已做出规定。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刚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近期提请审议的背后，是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方式和途径让人防不胜防。商家获取消费者手机号、通讯录、精确地理位置等多项与消费无关的信息，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余刚等法律专家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制定行业管理细则，督促餐饮等行业优化服务，加强行业规范，同时设立扫码消费的数据安全“边界”，拓宽消费者的侵权投诉渠道。

深圳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扫码消费的相关问题，将进一步展开相关调查、监督工作。

扫码被会员，信息遭收割——扫码点餐「强制关注」该管管了

（参与采写：杜伊婷）